

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

何晓明○著



東方出版中心

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

何晓明○著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 / 何晓明著. —2 版.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7. 8

ISBN 978-7-80627-162-9

I. 知… II. 何… III. 知识分子—研究—中国—近代
IV. D69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02281 号

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40 千

印 张: 22 插页 2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27-162-9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崇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近一百多年来,在中国现代化的曲折进程中,这一忧患意识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全书分上下两篇共 12 章,以坚实的历史资料作基础,以广阔的文化视野为坐标,紧紧扣住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休戚与共的联系,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及理想追求,其中有传统与现实之间的艰难选择,有中西思想文化碰撞后的深层思考,有科学理性与民族情感的矛盾冲突,从而较具体、深刻地论述了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的社会角色及承担的历史使命。

序

冯天瑜

“中国现代化”和“中国知识分子”都是切关宏旨的议题，而读者诸君手头的这本何晓明教授所著《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一书，则从二者的相互关系展开论述，颇能开启神智，引人入胜。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走出中世纪的漫长过程，是涉及广义文化诸层面的复杂历史变迁，其基础性内容与物化表征当然是生产方式的变革，就早期现代化而言，是指手工劳作向机器生产转换，动物性能源（人力、畜力）主导地位被非动物性能源（煤、石油、水力等）所取代。不过，单纯的经济因素并不能保证一个社会、一种文化赢得完整的现代性，只有当社会组织、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的转型与之协同配合，现代化大厦才得到坚强的支撑。而构成现代性的诸要素，又全都与人的现代化直接相关，因为，现代人是现代化事业最富能动性的因素，现代化的生产力、现代化的社会组织都由现代人创造；而现代人的塑成又是在现代化实践中逐步实现的。总之，“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这一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进程的核心题旨。

人的现代化包括人对新技术、新艺能的掌握，但又决不局限于此，它还有“工具理性”之外的更为广阔的内容，这便是一种全新的认知水平和精神境界，其内核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转换。有人将一种文化的现代性概括为“擅理智”与“役自然”，前者指人们摆脱中古流行的神学、准神学导致的蒙昧状态，达成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性认识；后者指拥有理性的人实现对自然的有效控制和充分役使。这种概括大体反映了早期现代化的诉求——对人的理性和理性的人的召唤。

就现代化的原发地区——西欧而言，人们突破知识从属信仰、理性屈就神谕的中古怪圈，经历了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16世纪的宗教改革、17世纪的科学革命，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方正式孕育出被理性精神武装起来的现代人，其先锋便是西方知识分子——与中世纪神学家迥然有别的知识拥有者。康德曾以“有勇气在一切事务上运用理性”概括启蒙运动的特质。余英时认为，“这句话恰好可以代表近代知识分子的精神”^①。从这一意义言之，知识分子的内涵不应简单归结为“接受过高等教育，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群”，他们还必须是具备理性精神，并能以之思索和推动社会进步的觉醒者。

现代化既然是一个理性化过程，因而以研习、运用、传播理性（或曰知识）为职志的知识分子必然构成现代化事业的活跃力量。当然，知识分子并不能包打天下，他们的作用是有限度的。现代转型的基础是生产方式变革，知识分子提供的新知识在其间作用不可低估，但主力军毕竟是工人和农民；现代转型在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则必须实现社会重建和文化重建，西方各国的“社会重建”任务主要由逐渐壮大的中产阶级承担，知识分子则恰当地自我定位在“文化重建”方面，以狄德罗为代表的法国百科全书派所做的浩大工作堪称典范。在长达几世纪间并肩成长的西方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协同努力，与其他社会阶层一起实现西方原发式现代转型。

走着后发式现代转型之路的中国，其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是19世纪中叶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19世纪末叶方开始出现，20世纪则艰难曲折地成长。由于内外条件的制约，中国的中产阶级底蕴不足，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宗法——专制势力的依附屈从，而且，中国历来缺乏市民政治独立、文化自主的传统，因而在精神上患有先天软骨病，既无力量，也无胆略担当起社会重建的使命，于是，这一日渐紧迫的任务连同文化重建任务，一并落到同样发育并不充分的知识分子肩上。而中国知识分子则义不容辞地一身二任，这除了客观条件所使然（如中产阶级不能担负分内责任）之外，更和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渊源与特色有关。

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是春秋战国以来绵延两千余年的士大夫。作为现代

社会和全新世界背景的产物,知识分子在时代意识、知识结构、角色认同等方面都与旧式士大夫颇相径庭,特别是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知识分子,基本摆脱了君统和道统的双重负担,不再以“忠君事亲”、“代圣贤立言”为行事作文准则,其生活路径也大体走出了“学优登仕”故辙。然而,知识分子虽脱下了士大夫的长袍,但在精神上却承袭着士大夫的某些传统特质。秦汉以降,中国的社会阶层序列一直是“士农工商”,与商人陪于末座相反,士人历来居四民之首,他们不仅自视国家栋梁,也被社会认作人中精英。“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②，“天将降大任于是人”^③，便是士子豪迈情怀的写照。在认知层面，士人以“求道”、“闻道”、“弘道”为最高旨趣，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为使命；在政治层面，士人以“平治天下”为目标，而这一目标只有在依附君权的情形下才能得以实现，由此造成士人的“忠君”、“事君”特性，“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④是其心态的流露。汉代选举制，尤其是隋唐以下的科举制将士人的治世追求变为活生生的制度性现实，也将士人与君权牢牢地维系在一起。总之，无论是士人的自命，还是社会的期盼，士人都扮演着“精神导师”与“官僚后备队”的双重角色。19世纪中叶以降，中国传统社会的格局在崩解和重组，但从士大夫转变而成的知识分子还继续习惯性地承担着这双重使命，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将西方知识分子和西方中产阶级分别担当的文化重建和社会重建任务一肩挑起的历史因由。

接受了现代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各有其专业领域，其中一些人在学术天地足以与国际同行并驾齐驱，不乏文化大师级人物，他们在文化重建方面的贡献，功不可没。然而，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作为自觉不自觉的士大夫传人，又往往或显或隐、或深或浅地保有士大夫的品格——“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抱道忤时”的忧患意识，“经世致用”的认知取向，以及与政治和权力割不断的联系性。由于这些品格的作用力，加之客观环境的挤兑——如内忧外患的中国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以致相当比例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不是走进书斋、实验室潜心于文化重建，而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以文化人和社会良知体现者的双重角色，投身民族救亡、社会变革、大众启蒙事业。低吟“布衣老大伤怀抱，忧国无端有叹声”^⑤的康有为，虽然也

有构筑思想体系的努力,但毕竟有欠精当,他的闪光之处却在于鼓动变法、导演“百日维新”的悲壮剧;康氏弟子谭嗣同则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雄精神”,演出戊戌变法最惨烈的一幕,人们纪念于此,显然远过对谭氏《仁学》一书的关注。至于以“革命军马前卒”自命的邹容、蹈海自尽以警醒国人的陈天华,所著之《革命军》、《狮子吼》、《猛回头》、《警世钟》等,其革命鼓动作用大大超迈其文化建设作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作家鲁迅,青年时代即立志“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固然是中国新文学的丰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也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力,但鲁迅的主要心志却在以他的作品(尤其是杂文)作为投枪和匕首,杀向旧营垒,以救助苦难的国人。

总之,在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也担负着文化重建任务,充当科学文化知识的宣教者,但与此同时,一批最活跃的知识分子则成为近现代中国历次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的活动家、领袖人物,还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则响应革命前驱的“将令”,使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工作隶属社会改革和社会革命,成为其工具与武器,而纯粹学科意义上的文化重建,往往被看作等而下之的不急之务,少数潜心于学科建设的文化匠师(如哲学家熊十力)长期被社会所冷待。

晓明撰写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一书,准确把握住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中心课题——觅求既能维护民族独立,又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政治共同体,并将知识分子为建成这种政治共同体所作的探索性努力分阶段揭示出来,从而将知识分子复杂的心路历程与坎坷多歧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水乳交融地编织起来,人景辉映,构成一组色彩斑斓、引人入胜的图景。也许是中心主旨所限,本书对孜孜于文化重建的学者型知识分子着笔较少,而这类知识分子的默默耕耘实乃现代化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现代化是未竟之业,中国知识分子也在成长发育之中。本书所描绘的主要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众生相,但今日之知识分子仍然可以从这些前辈身上照见自己的影像。顾影以自励,顾影以自省,或许正是本书形诸笔墨之外的意蕴所在。

晓明英年博学，素以才思敏捷为友朋称道，而我更欣赏他的达观与洒脱。这种达观与洒脱同前文提及的“理性精神”颇有相通之处。以此言之，晓明已逼近真实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境界，令人羡慕。不知熟识晓明的诸君以为然否。

1996年春节拟于武汉大学寓所

注释：

- ①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 ② 《论语·泰伯》。
- ③ 《孟子·告子下》。
- ④ 范仲淹：《岳阳楼记》。
- ⑤ 《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

序	冯天瑜
---------	-----

上 篇

第一章 舞台与角色	003
一、“知识分子”界说	003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诞生	004
三、士与中国古代社会	007
四、近代知识分子六代人	015
第二章 社会良心的终极关怀	025
一、西方：从神本到人本	026
二、中国：人间正道的忧患之思	028
第三章 现代化：世界与中国	036
一、“现代化”释义	036
二、两种类型的现代化：英国与日本	042
三、中国现代化的特征	046
第四章 传统与现实之间的艰难抉择	058
一、在传统与现实的夹壁中	058
二、保守主义	061
三、自由主义	065
四、激进主义	072
第五章 文化重构、社会整合与现代化主题增容	083
一、渐次深入的认识进程	083

二、科技进步	086
三、科技进步+政治改革	089
四、科技进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	092

下 篇

第一章 转型之际的困惑与探寻	099
一、亦“开风气”亦“为师”	099
二、开眼看世界，“师夷”倡先声	105
三、虚幻的“天国”	119
第二章 开端：自觉与不自觉之间	127
一、“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127
二、跨出国门	133
三、从“求强”到“求富”	140
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46
五、“种豆得瓜”	153
第三章 变革的尝试	160
一、大梦唤醒，“公车上书”	160
二、思想启蒙	164
三、“布衣改制”	177
四、昙花一现	187
五、秘而不宣《大同书》	192
第四章 开创新纪元	201
一、振兴中华	201
二、三民主义	204
三、“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208
四、临时政府的现代化色彩	213
五、《建国方略》	218
第五章 主题揭示：民主与科学	227
一、“吾人最后之觉悟”	227

二、五四运动	230
三、打倒孔家店	236
四、科学精神的高扬	241
五、现代化道路的新启示	250
第六章 路在何方	263
一、东方化还是西方化	263
二、“全盘西化”与中华本位	271
三、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	275
四、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283
第七章 沉重的起飞	294
一、经济建设的辉煌与暗淡	294
二、知识分子的幸运与困厄	303
三、浩劫后的反思：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	313
四、希望升起在二十一世纪	319
结语 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命运	331
后记	338
再版后记	340

李郁清和董联新
李郁清陶舟中
意於



上 篇

江東湖頭
人頗有忘
日暮夕
月十五日
中區此
以役第
出年



第一章 舞台与角色

如果将人类社会比作一座色彩斑斓的历史大舞台,那么,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便是这舞台上来去匆匆的过往角色。斗转星移,岁月沧桑。当今天的人们面对着“地球村”的喧闹繁华而感叹文明进步的雄飞突进之时,理性必然要求他们回过头来,省视自身的足迹,检讨这大舞台上各色人等表演的精彩与否,以利于历史正剧的幕落幕启、未有穷期。

知识分子,便是这各类角色中尤为引人注目的群体。

一、“知识分子”界说

在人类的语义概念系统中,“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是晚近一二百年间的事情。一般认为,它是由俄国作家彼得·博博雷金于19世纪60年代首先提出的^①。“知识分子”在俄语中写作 интеллигэнт,是由 интелл'экт(智力、智能)和 гэний(天才)两个单词组合而成^②。因此,从词源学上考察,博博雷金提出的“知识分子”概念,更侧重某种智商的因素,某种特殊禀赋的因素,而与望文生义的“有知识的人”的一般理解,相去甚远。

一百多年来,人们对“知识分子”的诠释众说纷纭,大致归纳,有如下诸种说法:

- (一) 受过相当程度教育的人;
- (二) 受过教育并且从事脑力工作的人;
- (三) 受过教育并从事创造、传播和使用文化的人;
- (四) 受过教育后气质发生变化,从而在思想与行为上带有人文主义倾向

上 的人；

(五) 以追求知识为目的而不是以其为手段的人；

(六) 能够综合各种思想,以超越自己的阶级背景,并且以了解整个社会、解决社会上的问题为职责的人；

(七) 超越世俗的顾虑,在象征世界中为各种重大问题寻求解答的人；

(八) 以理念世界来批判现实世界的人^③。

根据西方学者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并且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还必须具备超越于个人及其所属团体的私利之上,深切关怀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利益的品格。因此,美国学者 E. 希尔斯称知识分子为“对神圣事物具有特殊的敏感,对他们所处的环境的本质和导引他们的社会的规律具有不寻常的反思能力的人”^④。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种具有特殊含义的“知识分子”,只能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从时间上看,作为一个成型的社会阶层,它的出现不会早于 18 世纪。

文化背景、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等等方面的巨大差别,导致了东西方文化进程中众多错位现象的发生。如“知识分子”社会阶层的产生,便是其中饶有兴味的问题之一。

比照西方学者的理解,我们发现,在中国历史上,类似于西方“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群体,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这便是孔子及其儒家学派所论的“士”。

关于“士”,本章稍后将要展开详细的论述。这里所强调的是,排除掉东、西方语言在表述方式上的差异,从实质的层面上把握要义,我们可以认定:特定含义的知识阶层的产生,中国比起西方来要早得多,因此,探讨中国知识分子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者的目光应当超越近代的藩篱,而从悠远博大的中国文化史中去追根溯源。

二、中国知识分子的诞生

历史告诉我们,专职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阶层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社会大分工的产物。社会生产力已经达到可以养活一批完全

脱离直接创造物质财富的体力劳动的社会成员的水平,而此时的社会又迫切需要这样一批人来从事诸如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等等专职活动,于是,脑力劳动阶层便应运而生,它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一阶层,西方学者帕森斯(T. Parsons)称之为“文化事务专家”(Specialists in culture matters),他们可以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最初形态。

在这一层意义上,笔者认为在“士”以前,中国殷商时代的巫史正是专职的“文化事务专家”,因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滥觞。

殷商西周时期,中华民族刚从野蛮时代步入文明时代,社会分工日趋细密、固定。自从传说中的颛顼时代“绝地天通”以来,专司人神交通的巫,逐渐职业化、世袭化。另一方面,随着阶级分野的明朗化、统治秩序的制度化,以及文字的创制和普遍使用,巫的职责也由单一的占卜扩大为参与政治管理。“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⑤巫参与国家管理的主要方式是“掌官书以赞治”^⑥。他们在甲骨文中被称为“作册”、“史”、“尹”。殷商西周时期,史与巫通常是二任而一身,所以后世也就以“巫史”相称。

巫史在殷商西周时代的社会宗教、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宗教方面说,他们是神人交通的媒介,因而是神的意志的唯一权威阐释者和神权的实际掌握者。从政治方面说,巫史以上天意志的代表自居,有权训御君主的言行。“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瞽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⑦“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⑧巫史不仅是社会的精神领袖,而且在政治统治机构内也居于显赫地位。正如王国维所论: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大史与大宰同掌天官,固当在卿位矣。……其中官以大史为长,秩以内史为尊,内史之官虽在卿下,然其职之机要,除冢宰外,实为他卿所不及,自诗书彝器观之,内史实执政之一人。其职与后汉以后之尚书令、唐宋之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明之大学士相当,盖枢要之任也。此官周初谓之作册,其长谓之尹氏。……其职在书王命与制禄命官,与大师同秉国政^⑨。